

从隶变与楷变看书法的时代性

陶小军 王菡薇

内容提要 作为兼具实用和审美两重性质的艺术门类,书法艺术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与时代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了一起。隶变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,是在自两周以降直至秦汉各时期不同社会背景的持续影响下完成的。西周时,汉字的书法以庄重典雅的风格示人,至西周晚期起,书法开始出现隶变的萌芽。春秋战国时期,分裂的局面赋予了书法艺术地域个性特征,而各国间交往的需要更是强调了其中的共性关联。秦统一后,尽管小篆成为了标准字体,但隶书最终于两汉时期迎来发展的高峰,而到南北朝时期,继隶变之后的楷变又将书法艺术的发展带入了另一个高潮。

关键词 隶书 楷书 书法艺术

陶小军,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在站博士后、文化产业学院副研究员 210013

王菡薇,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210097

书法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一门艺术,兼具实用和审美两重性质。书法的美通过墨色变幻的线条体现,是黑与白组合的艺术。两种具有强烈反差的色彩在相互对立、相互协调中互相融汇和贯通,形成了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形式语言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书法本身是字符的集合体,它所包含的文字意义本身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。然而,不同书写者所创造的书法,拥有不同的结构形态美,又使得书法作品具有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。

书法观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内涵,其表现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,但始终保持不变的是书法中的笔墨方法和对审美气韵的追求。书法的创作是一种文化行为,那么它当然应该为当代新的文化演进服务,而书法家在进行创作时的感受不可能游离在当代现实文化外,故熊秉明称:“无论他写的成败,作品总是要反映他的性格、学养和经历的,并间接反映时代风尚与地域影响。”^[1]书法作品是最能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。

“一代之书,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……观晋人字画,可见晋人之风猷;观唐人书踪,可见唐

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中国近现代书画市场发展史”(项目号:14BA011)、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“艺术品传播与艺术创造活力研究”(项目号:14DH49)、江苏省文艺产业研究基地阶段性成果。

[1]熊秉明:《熊秉明美术随笔》,[北京]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,第182页。

人之典则。”^[1]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济、政治和文化风貌,不同的风貌特色组合起来,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时代风格。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风格,而后者又造就了不同的书法风格。作为实用性很强的交流形式,书法在各个时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面貌。时代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需求,而社会的需求反映在书法艺术上,就是每个时代各不相同的书法风貌,连贯起来,就是文字发展的脉络。“书画作品本身就是表现的另一种历史,作品本身其实就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记录。”^[2]

—

文字的演变是在社会环境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发展的,“在影响文字发展的诸多因素中,首先应该突出社会对文字的需求……社会对文字的需求的发展决定了文字发展的整个历史的规律。”^[3]中国文字亦是如此。文字是语言的书面记录形式,而语言的发展,则与时代的发展同步,新的语言总是在旧的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没有了时代的基础,语言就失去了前进的基石。

中国文字在发展过程中,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阶段——“隶变”阶段。隶变的过程来自于社会的需求,在社会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取得了长足发展的背景下,民众对文字有了新的形式要求,故隶变“以书写性简化为基本功力,最终导致古今文字形体的根本变革”^[4]。

汉字从甲骨文、金文,发展到今天的体系面貌,经历了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隶变过程,将汉字从象形的古文字变成了利于书写的抽象符号。这一变化,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,是在社会经济、文化都达到一定发展程度后,文字为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自然幻化的结果。郭沫若说过:“在字的结构上初期的隶书和小篆没有多大区别,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……画弧线没有画直线快,画圆形没有画方形省……这样书写的速度便自然加快了。”^[5]社会生产力决定了当时社会的总体面貌,时代面貌又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,社会的需求导致了隶变的产生,隶变的文字又进一步服务于社会需求。这是时代演进所产生的必然结果。

统称为大篆的字体,在历史上使用时间相当长,在字形结构上有极大的随意性。西周时期,实行的是分封制的中央集权国家,政权稳定,礼教渐兴,政局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,形成了西周时期稳重的时代风格。崇尚文明且偏重含蓄的总基调推动圆笔的盛行,笔法也由此出现了尖、圆、肥、钝等变化,这些充分反映在西周时期的钟鼎文字中,成为后世书法审美的主流基调。

西周晚期,周王的统治日渐衰微,各地诸侯逐渐各自为政。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,大篆也出现了各种变体,其中,出现了与今文相似的字形。《水经注》中记载:“孙畅之尝见青州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塚,得桐棺前和外隐为隶字,言齐太公六世孙,胡公之棺也。惟三字是古,余同今书。”^[6]这说明在西周王朝晚期,已经出现了文字隶变。

由于大篆的书写要求笔划平缓,粗细相当,弯折圆转,不能流露出笔尖的波折,这样的字体形态对书写者要求很高,并且费时费力,很难满足大量文字书写的需求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,社会对于文字的需求量增加,这种需求使得庄重典雅的大篆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,各种或书写方便、或具有装饰意味的文字开始出现,极大地丰富了汉字系统,从而引发了隶变的萌芽,汉字“摆脱了古文字婉曲线条的束缚,开始步入今文字阶段”^[7]。

[1]刘熙载:《艺概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,第159页。

[2]陶小军:《中国书法艺术的时代性特征》,〔南京〕《艺术百家》2014年第1期。

[3]〔俄国〕伊斯特林:《文字的产生与发展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,第499页。

[4]李印华:《从隶变过程看书体演变规律》,〔哈尔滨〕《书法赏评》2008年第6期。

[5]郭沫若:《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》,载《现代书法论文选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,第403页。

[6]〔北魏〕郦道元著、陈桥驿注释:《水经注》,〔杭州〕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,第267页。

[7]王宁:《汉字学概要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,第53页。

二

与稳定的西周不同,战乱与国家政权的快速更迭,是春秋时期的时代基调。春秋战国时期,政权分裂,社会进入了自由发展的时期,生产力较此前有了明显的提高。战争冲突、贸易交流、文化交往等活动的需要使社会对文字的使用有了大量的需求,对文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隶变的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。

春秋早期,各国都沿袭周时的大篆书风,书体沉着端庄,体现出周时礼乐制度下的严谨性与正统性。春秋晚期,各诸侯国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独立发展过程,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,文字因其自由性与艺术性的需要,也呈现出众多不同的面貌。然而,由于战乱、贸易等交流的需要,又使得各国之间文化相互影响,相互融合,产生了一定的共同性,这种相异性与共同性相辅相成的局面,正是这一时期的时代面貌。

青铜器上“锡命”格式的铭文逐渐消失,随之出现的是“余某某之子”、“子子孙孙永保用”、“某某择其吉金,自作某器”等铭文,周王朝的权威性正在逐渐消失,各诸侯国各自为政,遂在铭文上凸显自身的国家荣誉感。而从书写风格来看,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风格。秦国由于地处西北,民风淳朴,保留了周的书写风格,显得严谨方正。晋国的文字以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为代表,出现了大篆夹杂蝌蚪文的写法,书写风格随意,出现了隶变的现象。楚国位于南方水系密集之地,文字显得灵动优美。燕国文字与传统金文相似。齐国东靠海,经济发达,文字显得简单而方硬。这一局面在春秋晚期开始出现,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时期,形成了以地域为特征,各国之间差异明显的书法风格。从严格遵从周王室的号令,到注重本族群的荣耀,这样的变化,地域的变化,是社会文化在书法上的反映,也是书法艺术的时代性的体现。

战国晚期,各国间的拉锯争霸更加剧烈。由于战争的需要,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多,而另一方面,随着时代的演进,社会生产力亦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。铁冶炼技术的普及,铁制工具不仅促进了战争的进行,对农业也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,使得生产力大大提升,大量的荒地开垦出来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贸易也频繁起来,经商致富在当时已经是常有的事,商人通过经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,商业活动中对于契约、债券等文书的需求,也大大增加。

战国时期“士”阶层的产生,使得这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。《荀子·荣辱》中记载:“农以力耕田,贾以察尽财,百工以巧尽机械,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人后知能尽官职,夫是之谓之平。”士人以自己的才能,供职于公侯之家,形成社会一个特定阶层。士人的产生使得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书认字,文字不再局限于上层贵族,下层官吏、庶人也有了接触文字的机会。社会文化繁荣,学术下移,由原先的学在官府变成了学在民间。这些都促进了书法的繁荣。

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,各国文字有着各自不同的面貌,但总体来说,由于交流的需要,其共性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^[1],从《曾侯乙墓竹简》、《青川木牍》、《包山楚简》等为代表的战国早中期代表性书法文物的面貌看,此时实用汉字在字形上与篆书已经有了较多的差异。

《曾侯乙墓竹简》书写于公元前433年之前,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,所出竹简有字简240枚,6696字,记录了随葬物品。书法用墨书写在竹简上,笔划尖锐凌厉,起笔顿按,结尾处提笔。笔划波折不明显,总体仍具有篆书的风格,但横折等笔划的书写,已经出现了隶书的面貌。

《青川木牍》于1980年出土于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。木牍正面记载了公元前309年(秦武王二年),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《田律》等事,背面为与该法律有关的记事。该书法用墨书书写

[1]刘云:《战国文字异体字研究——以东方六国文字为中心》,北京大学博士论文,2012年6月,第2页。

在木牍之上,书写规整,结体方正,字间距宽松,布局秀丽工整。笔划较随意,撇捺等笔划出现波折,总体上仍为篆书面貌,但可见明显的隶意。

《包山楚简》1987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二号战国楚墓。计有278枚竹简和1枚竹牍。这些竹简记述的内容丰富,纪年明确。该书法墨书竹简,结体圆转,灵动柔和,总体呈现出篆书的面貌,但笔划的起笔、粗细,均呈现出较强的随意性,可看出隶意。

春秋战国时期,政局的变更、生产力的发展、社会关系的变化,种种情形相互关联,相互牵制。在这样的时代风貌下,文字开始了从书写规整、精美的大篆,向书写简易、快速的隶书转变的过程。秦统一后,虽然对文字有了统一的规定,但隶变的进程仍然没有停息。

三

秦王朝兼并天下后,秦始皇制定了统一规范的文字。当时正规文书以规整的小篆书写,而在书写一些讲求速度、工作量大的文书时,则多使用较为便捷自由的变体篆书,在八种变体之中,有一种便是隶书^[1]。有些官方法规,也使用不同于小篆的潦草文字书写,如秦始皇二十六年铸刻的《高奴铜石权》,文字书写便与小篆大相径庭,这是书法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。史载“秦狱吏程邈善大篆,得罪始皇,囚于云阳狱,增减大篆体,去其反复,始皇善之,出为御使,名曰隶书”^[2],可知程邈在狱中创造了隶书,被秦始皇发掘,提拔为御使,但事实上隶书的创始过程在春秋战国就已经萌芽,即便程邈创造了隶书,也应当只是对前人成果的改良及总结。但这段记载带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,隶书因其书写的便利性,已经在下层民众间流传开来,这是时代使然,即便秦始皇加以控制,也无法遏制隶变的进程。

现存秦代隶书作品主要有《甘肃天水放马滩简》、《湖北云梦龙岗简》、《湖北云梦睡虎地简》等,这些竹简均以墨书写,结体方正,笔划有明显的波折起伏,书写速度快,起笔处顿按,收笔处上提,具备了隶书的基本面貌。秦始皇虽然规定了统一文字为小篆,但仍无法遏制隶书的使用,隶书正以其便捷性与实用性,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使用频繁的文字,故隶变的过程乃是时代使然,是为适应时代政治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必然结果。

汉代是隶变的大发展时期。汉代延续时间长、统治稳定、疆域面积大,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,生产力发展速度加快,逐渐形成了稳定、富庶的社会面貌,而崇尚强健之美则成为了这一时期的追求,这在同一时期的其他艺术品中可见端倪。无论是画像砖石篆的平面形象,还是石刻辟邪羽兽的立体造型,无不彰显着强健的体魄与雄迈的气势,这与当时的社会精神面貌,应该是一致的。

汉武帝时,政局稳定,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,国家进入强盛阶段。此时,汉武帝颁布了强化文字书写规范的政策,并规定了奖惩制度,这一制度,使得社会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。在社会下层,隶书由于其便捷性,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,隶书“起于官狱多事,苟趋省易,施之于徒隶”^[3],可见其一大优势就是书写便捷简省,这一特色得到了对文字书写有很大需求的下层官吏的青睐。这一时期的书法以《江陵凤凰山木简》、《银雀山汉墓竹简》、《马王堆帛书》为代表,这些书法有的书写在竹简上,有的书写在绢帛上,书写材料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字体更加方正,笔划呈现出“蚕头燕尾”的特征,起笔顿按,收笔上提,撇捺重按,波折明显,从结体到笔划上,都已经具备了隶书的特征。

[1][东汉]许慎:《说文解字》,[北京]中华书局1963年版,第315页。

[2][刘宋]羊欣: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,载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,第44页。

[3][汉]班固撰、唐颜师古注:《汉书·艺文志》,[北京]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,第19页。

四

在隶变完成之后,书法艺术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。伴随着造纸术的普及,社会活动中的书写需求变得更多,于是较之隶书更加适应社会需要的楷书字体应运而生。隶书中如“蚕头燕尾”等夸张笔法逐渐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平直简洁的笔画。因此,隶到楷的变化是篆到隶的变化的延伸,二者具有质同形异的特点。南朝时期我国书法演变成楷书,墓志也都用楷书写成,用笔健挺简畅,秀美放逸,结体平和冲融,端庄秀丽。刘宋时《爨龙颜碑》已鲜明地显示出汉代以后书体的楷化特点。《爨龙颜碑》全称《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龙颜碑》,爨道庆撰文,此碑为南朝刘宋龙骧将军、宁州刺史、邛都县侯爨使君的墓志。《爨龙颜碑》在碑版很少流传的南朝,使南朝碑刻书法得以存载,可惜在那个时候,仍依袭了前代的习惯,碑铭的书丹人,没有将他们的姓名刊刻出来。“此碑字体笔画方骏、体势雄强,是以汉隶为骨,魏钟太傅真楷为形”^[1],雄健浑厚又不失雅致。《爨龙颜碑》虽有隶意(如有些字横、捺及长撇伸长带有波势),却已明显地跨入了楷书的境地。其横、竖、趯等皆为楷书笔画,起、收笔多方笔,峻朗爽利而变化多端。结体匀整,字体方正,苍浑朴茂。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赞其为“古今楷法第一”。

刘宋明昙懋墓志,文字尚清,楷书,多用方笔,凝厚谨严,有隶意。具体到笔画方面,如撇笔,无论长短,以出锋为之,雄强中透出俊逸,静穆中有流动,转折处则圭角刻露。在南朝墓志中,较笔法精美者,属雄强一路。类似的笔画特征在后来的北魏贵族墓志中非常具有代表性,仅就此而言,明昙懋墓志可以作为北方标准魏碑体书法的直接先导。

南齐永明五年《刘岱墓志》志文23行,计361字,楷书。用笔沉静肃穆,笔画清劲,骨力内敛,行笔不紧不慢,有提有顿,横画较细,竖画较粗;结体秀丽工整,厚重宽博;章法疏密得当,雍容大度。该墓志笔法和结体都已是成熟的楷书规范,完全摆脱了隶书的影响。“既有北方书法的方整厚朴,又有南方书法的潇洒精丽,字里行间流露出‘二王’遗韵。”^[2]同时,我们看到了“十分精美的楷书和与之完全匹配的楷书刊刻刀法”^[3],故该墓志有着较高的书法成就,可以看作南朝铭石书楷化的一个坐标点。

结 语

综上所述,书法本身是从实用的汉字书写中发展起来的艺术,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。书法风格来源于时代精神。从前人传下的书法作品中,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书法有各自的时代风格特征,书法艺术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,就与时代性紧密联系在了一起。隶变是汉字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,是在自两周以降直至秦汉各时期不同社会背景的持续影响下完成的。西周时期,汉字最初以典雅庄重的大篆字体示人,而伴随着周王朝的衰弱,旧的字体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,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,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书写需求,隶变的轨迹也变得逐渐清晰。这种趋势,即便是拥有强大文化专制力的秦王朝也无法扭转,使得汉字书法最终在两汉时期完成隶变的过程。由隶法取代篆法,本质上是应书写需要扩大而决定的;而到南北朝时期,同样的需求则促使隶书进一步向楷书过渡,中国书法复又迎来了楷变的发展阶段。而这一过程的转变,正是书法时代性的体现。

[责任编辑:平 啸]

[1]凌云超:《中国书法三千年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,第107页。

[2]林树中编著:《六朝艺术》,南京出版社2004年版,第156页。

[3]黄惇:《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》,〔南京〕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,第273页。